

华北城市经济近代化研究

张利民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华北城市经济近代化研究

张利民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北城市经济近代化研究/张利民著.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7

ISBN 7-80688-135-2

I. 华… II. 张… III. 城市经济-经济史-研究-华北地区-近代 IV. F29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7450 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 项新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6354
(022) 23075303
电子信箱: tssap@public.tpt.tj.cn
印刷: 天津雍阳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 27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华北区域城市史为重点研究方向。《华北城市经济近代化研究》是该所所长关于近代华北城市史研究的又一部学术专著。该书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华北城市经济的近代化,紧紧围绕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经济近代化主要标志的观点,从城市经济近代化的起步、外界环境的变革入手,系统地梳理和论述了最能够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对外贸易、商业和商品流通网络、近代工业、金融组织与市场等方面,阐述其发展和演变,总结其特点,以期能够较全面了解近代以后华北城市经济的发展。

《华北城市经济近代化研究》的一个突出之点,是强调市场经济在经济近代化中的推动作用。作者认为,中国等后发展国家 20 世纪后经济的发展进程与西欧发达国家有较大的不同,西方国家通过商品倾销、资本输出和资源掠夺等,促使这些国家一些城市的内外贸易率先兴盛,城市经济功能得以增强,近代工业才随之出现和振兴。也就是说,中国城市经济的近代化,起步于与世界市场接轨后内外贸易的发展,起步于商品交易和集散功能的增强;近代工业的振兴,促使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重组,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的聚集能力,各城市根据自身的环境和条件,程度不同地向近代经济演变。因此,市场经济发展,是探索华北城市经济近代化的关键,也是华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于是,作者将商品市场结构的转变和商品流通网络的重构,放到研究城市经济近代化的

首要位置,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开埠通商后华北地区诸城市商品市场的性质、商业组织的专业化倾向、商业发展规模的扩大、商品流通网络的重构,以及近代金融资本构成。认为正是城市中商品市场的转变和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通过新旧交通工具组成的运输体系,促使商品流通网络的重构,形成不同空间范围的经济腹地,在推动城市本身近代经济崛起和发展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带动了腹地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经济重心东移的论断。认为近代以后在以城市为经济中心形成商品流通网络的同时,市场以“无形之手”引导着商品的生产和走向,促使华北地区经济呈现出分化和重组的复杂格局,经济重心逐渐由内地向东部沿海转移,这种东移的趋势一直延续至今。

《华北城市经济近代化研究》的另一个突出之点,是探讨了近代交通运输体系的形成与城市经济近代化的相互影响及推动作用。作者认为,落后的交通运输曾是华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之一,近代以后轮船代替帆船,实现了与世界港口的通航;铁路和公路的迅速兴起,近代交通工具的使用,是华北地区交通运输方式的巨大变革。经过与传统交通工具的整合,形成了华北地区以近代交通工具为主,传统方式为辅,多种方式互补和多条渠道交织的近代交通运输体系。这样的交通运输体系,不仅直接推动了工矿和交通枢纽城市的出现和发展,促进了商品流通和农村农产品的商品化,更重要的是对该地区城镇、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和经济重心的东移具有十分突出的作用。

城市近代化和区域经济史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研究项目,但同时也是很庞大、很复杂的综合性研究,需要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以及建筑、环境学等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把握主体脉络,梳理文献资料,探寻各种路径,系统深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应该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大胆探索,并逐

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希望从事该项工作的研究人员,及时吸收中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构架,发挥优势,开拓视野,拓宽领域,形成特色,取得更大的成绩和进步。

李锦坤

2004年7月

目 录

序	李锦坤 (1)
总论	(1)
一、“华北”考析	(1)
二、空间范围与区位变迁	(10)
三、城市经济与近代化	(20)
四、前期研究成果与本书的立意	(30)

上编 开放与契机——城市经济近代化的开端

第一章 对外开放——近代化的起步与发展	(39)
一、开埠通商——华北近代化的起步	(39)
1. 天津、烟台——华北最早开埠的口岸城市	(39)
2. 华北的进一步开放——通商口岸城市的增加	(45)
3. 租界、租借地的出现和发展	(54)
二、对外贸易——城市经济近代化的初步发展	(57)
1. 早期的对外贸易及其特点	(57)
2. 天津与青岛——对外贸易中心的形成	(65)
3. 对外贸易发展的脉络	(85)
第二章 交通环境变革——近代化的催化剂	(94)
一、海运——相对封闭交通网络的突破	(95)
1. 轮船运输的兴起和发展	(95)
2. 远洋和沿海航运格局的演变	(100)

二、铁路和公路——陆路交通网络的主干	(105)
1. 铁路的开通与网络的形成	(105)
2. 以省会为中心公路网络的初成	(110)
三、传统交通——交通网络的补充	(117)
1. 内河航运与民船的调整	(118)
2. 陆路运输的整合	(123)

下编 市场化与工业化——城市经济近代化的标志

第三章 商品市场的近代化演进	(129)
一、市场与经济近代化理论概述	(129)
二、商品市场的近代化演进	(137)
1. 商品的国际化	(137)
2. 商业资本和组织构成的多元化	(141)
3. 商业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趋势	(152)
4. 商业主体的整合与演变	(156)
第四章 商品流通网络的整合	(163)
一、经济区域与商品市场层次	(163)
二、以天津为中心的商品流通网络与市场	(168)
1. 天津口岸中心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168)
2. 庞大的消费市场——北京	(174)
3. 颇具规模的中级市场和专业市场	(176)
4. 以城镇为主的初级市场	(184)
三、以青岛和济南为中心的商品流通网络与市场	(186)
1. 中心市场的出现与规模	(187)
2. 以集散转运为主要职能的中级市场	(189)
3. 颇具活力的专业市场	(197)
4. 逐步专业化的初级市场	(200)

第五章 近代工业的兴起与发展	(203)
一、起步与徘徊	(204)
1. 军事工业——民族工业之先河	(204)
2. 矿山的勘察和早期利用	(206)
3. 民用工业的出现	(208)
二、崛起与兴盛	(210)
1. 轻纺食品工业的迅速发展	(211)
2. 以资源为基础的矿山与化学工业	(233)
3. 具有潜力的机械工业	(245)
三、近代工业发展阶段与特征	(252)
1. 工业发展的阶段	(252)
2. 华北近代工业发展的特点	(258)
第六章 新旧金融组织的融合与市场重构	(264)
一、近代金融组织的发展	(264)
1. 外资银行的侵入	(265)
2. 华资银行的迅速兴起	(271)
3. 华资银行兴起原因和弊端	(281)
二、传统银钱业的重构与发展	(287)
1. 票号的兴衰	(288)
2. 钱庄银号的变化与发展	(295)
结语	(310)
参考书目	(315)

总 论

一、“华北”考析

“华北”一词在日常生活,以及经济、历史、地理和社会等各学科中被广泛使用,但是“华北”一词何时出现?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出现?为什么到20世纪以后使用频率如此之高?无论从实际应用的角度,还是学科建设的理论层面都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考订和研究,致使各学科在使用华北作为地域概念时,对其空间范围的划定以及所包含的内涵等,没有相应的标准和界定。一个词的出现有随意制定的成分,但是该词必定在某种意义上遵循其语义语境知识和话语语境知识,即一系列的背景设想,以及使用者理应遵循的有关真实性、明晰性、关联性、信息性等原则;一个词之所以被人们广泛使用,也必然遵循同样的认知基础。因此,追踪“华北”一词的词源,探索其出现的语境、语义和使用者的背景,是划分华北的空间范围和研究华北地区历史发展的第一步。

查阅明清时期的史料,可以发现各级行政官员的奏折等政府文本中,多使用南直隶和北直隶等行政区划来表述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从来没有使用过“华北”一词。清代中叶,清政府设置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后,朝野内外南洋和北洋的使用率很高,即便到了是光绪年间的李鸿章和张之洞,以及清末新政时袁世凯等奏折和函电,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公文往来,以及文人墨客等,多用具体的城池、地名、河流、关隘、山川,或者以江南、江北、(黄)河北、(黄)河南、中原等来报告情况和抒发情感,都不曾使用过“华北”一词。无论是《康熙字典》和《词源》等词典,还是《大清一统志》、《天下郡

国利病书》、《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等地理名著中也没有“华北”一词。由此大致可以推测在清代以前“华北”一词尚未见于政府文书或民间诗词小说。

东南沿海五口开埠通商后,西方国家在中国设立了使馆和领事馆,并把持了各地的海关。这些来到中国的洋人在向其政府汇报和向本国介绍中国时,沿袭了17世纪使用的“North China”或者“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来介绍中国北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状况,比较典型的是各国使馆和领事馆呈给其政府的报告、各海关的海关报告。如上海的江海关1843年的海关年报、英国驻上海领事1855年的贸易报告等,都使用了“North China”来介绍中国北方各省;^① 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等的汇报,或者写文章介绍中国时,也是使用“North China”,或者“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来表述北方各省。如1847年福钧(Fortune Robert)在英国伦敦出版的《在北方诸省三年的游历》(*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等。当时,西方人介绍中国时,是将“North China”与“South China”对称使用,以区分中国的南方和北方,直至现在也都沿用这样的词句。对“North China”和“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的翻译,在当时差别不大,一般均译为中国北方,或者北方诸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850年英国人奚安门(Henry Shearman)创办了上海开埠后的第一家英文周刊——North China Herald,周六出版,每期对开一大张4页,当时人将其称为《北华捷报》,这大概是已经知道资料中最早出现的将“North China”翻译为“北华”的,也是最早的与华北有关的词句。该报纸以上海为中心,如创刊号有各外商的广告、上海外侨名单和身份职业,有本市和外埠新闻。1859年该报被指定为英国在上海驻华领事馆以及首席

^① 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商务监督公署发表各项公告的刊物。1864年7月《北华捷报》改版为《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北华捷报》成为《字林西报》的星期副刊。身处中国北方的西方人,同样也使用“North China”,或者“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如天津海关1867年以及以后的年报、1892~1901年的十年报告均使用“North China”,1880年和1881年两个冬季海关港务部长络维特(William Nelson Limes)主编了小报,定名为Northern Post,当时人称为《北方邮报》,该报除了刊登海关的贸易统计和船只往来之外,也发表了一般新闻以及当地的社会事件。^①再如美国公理会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长期住在天津和山东,^②1892年他出版的《中国人的素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本来是写给《北华捷报》改版后的《字林西报》的文章,也是用“North China”,甚至用北纬37度的地理概念。即便他1899年撰写的《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研究》(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也是用“North China”介绍中国的北方。

我们再从日文进行考察。在日本,通常对中国北方使用“北支那”或者“北清”。从已经发现的史料中最早使用“北支那”和“北清”的,大概是曾根虎雄1876年出版的《北支那紀行》,该书所记除了沿途各城市的地理、历史等一般状况外,还绘制了各城市的城郭图,记录了北部地区机器局和造船局的总数、外洋军舰商船数量,以及炮台、屯兵人口、进出口商品等数量;1889年有仁礼敬之撰写的《北清見聞録》。1895年甲午海战后,日本第三舰队曾经出版了《北支艦隊事變紀念寫真帖》。^③在日本的外交文书中,也经常使

① 参见O.D.Rasmussen: *Tientsin An Illustrated Outline History* (以下简称雷穆森:《天津——插图本史纲》,中译本《天津历史资料》第2期),1964年,第51页。

② 明恩溥(1845年~1932年),1872年来到中国,长期在天津和山东传教,兼任《字林西报》通讯员,1900年被围困在北京使馆,1905年辞去教职在北京通州居住写作,翌年返美。随后他又到中国各省旅行,曾撰写了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③ 前二书藏日本东洋文库,后书藏天津图书馆。

用“北支那”和“北清”来介绍中国北方的情况,如 1887 年 6 月日本驻天津领事向日本通商省的商务报告的名称就是“北支那地方産出綿羊毛及駱駝毛の景況并關於買賣の景況”,报告中介绍了张家口、归绥、多伦、东蒙古等地的皮毛生产和天津出口皮毛的状况,认为“北支那毛货逐渐在世界市场上博得声价,故销路将扩大”;^①当年还有“北支那烟草税”的报告。以后日本驻天津和上海领事馆的报告中时常有“北支那”、“北清”、“中清”的词句出现,^②其报告的内容上也使用“北支那”和“北清”来介绍以天津为主的地方商人、市民和农民的状况。^③

上述资料可以大致推测,在 19 世纪无论是官方文书和文集,还是英语和日语中还没有看到明确的表述华北的词句出现,《北华捷报》所言及的“北华”,估计与北方的地域有关,并开始在一定范围内流传,其佐证是在《上海总商会月报》2 卷 9 号的调查中记载,1898 年在天津曾由商人兴办了资本 14 万元的北华制造烟草公司。^④因此,华北一词大概是从“North China”、“北华”、“北清”、“北支那”逐渐衍生过来的。进入 20 世纪后,“华北”一词在当时英语和日语的翻译中频繁出现,更重要的“华北”已经成为中国各界都接受并广泛使用的词句。

20 世纪初的 1903 年前后,在北京出现了名为《华北译著编》的中文杂志,是由文明书局编辑出版的,1905 年改名为《华北杂志》,这可能是最早以华北冠名的中文杂志了,说明当时华北一词开始逐渐在刊物等文化传媒领域使用。这时,有的企业以华北命名,如

① [日]外务省通商局:《通商匯纂》,第 8 卷,明治 20 年,第 187 页。

② [日]角山荣等监修《マイクロフィルム版領事報告資料収録目録》,雄松堂 1983 年版,第 49 页。

③ [日]外务省通商局:《通商匯纂》,第 13 卷,明治 23 年,第 665 页。

④ 转引自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83 页。

1914年在张家口的华北电力公司、1917年有天津的华北制革厂和唐山的华北唐山电力厂、1920年河北省清苑县的华北花边发网公司、1921年天津的华北毛品纺织公司、1924年山西大同的华北第一毛织公司等。周拂尘曾于1921年8月和1928年6月在天津创办了《华北新闻》和《华北晚报》。表明到20世纪20年代后华北一词已经深入人心,在民众中非常广泛地使用,甚至还有一些时髦的色彩。1928年10月中国政府成立了华北水利委员会,该会创办的《华北水利月刊》,标志着自然科学领域对华北的认同。

在北方也出现了以“North China”命名的英文报刊和书籍。如奥国人菲舍尔(T.G.Fisher)1905年创办的报纸 North China Daily-Mail,被翻译为《华北每日邮报》,北洋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人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博士1918年创办的报纸 North China Star,被翻译为《华北明星报》。^①甘霖(G.T.Candlin)是1878年来天津参加圣道会的英国人,他1909年撰书 *John Innocent: A Story of Mission Work in North China*,介绍最早到天津来传教的殷森德牧师,^②该书被译为《殷森德:华北传教记》。

日本使用“北清”和“北支那”更加普遍。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日本大使馆和领事馆通称为“北清事件”;专门汇集各国使馆和领事馆向通商省汇报各地商务的《通商匯纂》中,以“北清”和“北支那”记载了天津等领事馆的报告,如1902年有“北清各港冬季交通狀況,清國秦皇島ノ開港”、1907年有“北清地方ニ於テ石炭

① 参见 O.D.Rasmussen: *Tientsin An Illustrated Outline History* (《天津——插图本史纲》),中译本《天津历史资料》第2期,1964年,第155页。

② 殷森德(John Innocent)是英国圣道会(the New Connexion)即循道公会(the United Methodist Mission)的传教士,1861年4月4日从上海乘船到达天津,住在城东仓门口教堂附近,是最早到天津来的13名外国人之一;1897年3月22日偕妻子、女儿离开天津回英国,1904年11月28日因肺炎死与英国。参见《天津——插图本史纲》,中译本《天津历史资料》第2期,1964年,第5、22、149页。

需要及供給狀況”、1909 年有“北清鐵道ノ情况”等等,每年都有多项以“北清”或“北支那”为题的报告。另外,1901 年日本公使派候补领事官矢田视察秦皇岛开埠后的状况,矢田做成“秦皇島、山海關方面并二關外鐵道一部狀況視察復命書”,其中多次使用“北清”词句,^① 当时天津的日租界有日本军队即中国驻屯军,该部队时常向陆军省汇报搜集的情报,也经常使用“北清”的词句,如 1907 年 5 月有“北清駐屯列國軍兵力表”的报告,以后有关于北清的勘查地方、调查土地,以及通讯、装备等报告;甚至该部队也有时自称为“北清驻屯军”。在中国的日本人,特别是在北京、天津的日本人,使用“北支那”、“北清”的频率已经很普遍。如 1902 年古泽幸吉撰写的游记名为《北方支那》,^② 1903 年有木村条市的《北清見聞録》、小川运平撰写东京兴亚书院印制的《北清大觀》、讲述甲午海战的《北清事变日本の旗风》,^③ 1904 年有前田政四朗写的《北清事情大全》、高濑花陵撰写的《北清見聞録》,^④ 1906 年有川畑竹马编,三光堂和大清通运公司出版的《北清之刊》,1909 年有山本写真馆编辑的照片集《北清大觀》等等。当时在北京和天津由日本人开办的报纸中也有以“北清”冠名的。如在天津有 1903 年的《北清时报》、1903 至 1910 年的《北清报》、1903 至 1910 年的《北支那每日新闻》。^⑤ 1907 年日本人将原来的《北洋日报》改名为《华北时报》,直接使用了华北。

一个词句从口语中衍生和生成后,最初只是没有准确含义的

① 日本外交史料馆 3.12.2-28,清国诸港口居留地关系要件第一卷。

② [日]岡崎屋书店 1902 年出版,藏天津图书馆。

③ [日]森林黑猿述,天野节著:《北清事变日本の旗风 第五 救援之卷》,东京田村书店 1903 年版,藏天津图书馆。

④ [日]金港堂书籍 1905 年版,藏天津图书馆。

⑤ 参见贵志俊彦等编《天津史文献目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1998 年印刷,第 324、321 页。

不定性词语,随着政治经济等各界需要和认识程度的不断加深,逐渐赋予较规范的含义。华北一词的出现和流传可以看出,西方人从明代以后一直用“North China”来描述中国北方,日本人随即将其用汉字演化为“北清”和“北支那”;随后出现了“北华”,并使人们在地域概念上有一定的认同感。同时,在汉语中,“华夏”是中国的代称,“华”与“夷”常常是对称和对立使用的,西方入侵后列强政治经济势力的不断扩大,激发了国人挽回利权振兴中华的热情,“华”与“夷”的对立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夷”成为西方入侵者的代名词,“御夷”、“抗夷”、“制夷”等均表示当时对西方在华势力的抗争。在这样的语境下,20 世纪前后从多种路径衍生为“华北”一词,开始在国内各界人士中流传并广泛使用。如果说 1903 年已有以华北命名的中文杂志——《华北译著编》,那么说明在此以前使用华北一词不是个别的现象,有一定的传播者和受众借助中外媒体等渠道,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共识,并经过不长时间的流传,在人们中间有一定的空间印象和概念。这种空间概念,通过华北水利委员会的成立等从自然科学等学科,更加明确了华北具有一定空间范围的地理位置。

华北一词的广泛传播与日本的侵华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成立了伪满洲国,并蓄意进犯冀东、平津等长城以南,侵占中国,局势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于是华北问题引起中外朝野的广泛关注,这时华北是使用率非常高的词句,著作和时论中多以华北为题目,从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方面声讨日本的侵华行动。如吴蔼宸 1929 年撰写的《华北国际五大问题》、孙嘉会 1930 年的《华北革命史》、长江和老舍 1938 年的《华北六省抗日血战史》、以及华北停战协定和华北战区等专用名词、坚决保卫平津华北等口号,充斥报端杂志,“华北”成为各界人士呼吁抵御日本侵略首先触及到的话语。同时,华北一词也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如 1936 年有作者在《商业月报》发表了题为“经济开发

中华北棉产的现况”的文章,开宗明文作者议论道:“这里所谓‘华北’系指冀鲁晋绥察五省而言也,就是现在暄腾华北经济提携里的几省。在我国,本无所谓‘华北’、‘华中’、‘华南’名词之分。但自九一八以后,邻邦时文论著对所谓‘华北’、‘华南’、‘华中’等名词,特别予以发挥。一若我国南北景象,迥不相侔。究其实际,不过别具用心而已。”^① 在抗日战争期间,华北并不仅仅是有一定地域范围的泛指,而是通过行政区划设立了第一个以华北命名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1937年日本占领北京和天津等地后,于1938年2月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经过日本的一番筹划1940年3月由南京的维新政府和北平的临时政府共同成立了伪民国政府,临时政府的原班人马成立了华北政务委员会,以“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京、天津、青岛三市境内防共治安、经济及其其它国民政府委任各项政务,并监督所属各省、市政府”。该政务委员会管辖区域为:北京、天津、青岛三个城市直属于政委会,河北、山东、山西三省以及河南北部的1市39个县。这是日本傀儡政权在华北最高层次的组织机构,有它的法规和组织条例,设有委员长和常务委员,以及内务、财务、治安、教育、实业、建设总署和政务厅、秘书厅等,有自己的军队——绥靖军,统管上述省市的政治、经济,“受国民政府之委托,得处理对外关系之地方事件”。^② 1945年日本投降,华北政务委员会也随之倾覆。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建立了华北解放区。随着全国解放的临近,党中央为了加强党和国家对全国的管理,曾经设置了地方大区,华北也是地方大区之一。1948年8月26日中国共产党决定,以晋冀鲁豫和晋察冀边区为基础组成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为主席;管辖当时的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平原、内蒙古省和

^① 《商业月刊》,第16卷第12期。

^② 《华北政务委员会法规汇编》上卷,1941年版,第1页。